

第一章 理论与实践

——从理想社会主义到实践社会主义

20世纪，社会主义由价值理念转化到制度实现。倘若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原点，可以把此前的社会主义统称为理想社会主义，而把此后的社会主义统称为实践社会主义。

以这样一种视角划分社会主义的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势必被纳入到理想社会主义范畴之中。这合适吗？特别是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都用“理想社会主义”的“绳子”绑在一起，用“理想社会主义”的“框子”框在一起，这可以容忍吗？

答案是：只要这个“原点”本身是合适的，可以容忍的，由此出发进行研究的理论思维及其方法是合适的、科学的，那么一切都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一 渊源的辨析：社会主义 —— 空想社会主义 —— 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概念，经历过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演进。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最初是在人们研究社会现象和人的问题时所使用的术语，表示对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视。

1994年第3期《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刊载高放的论文：“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一词的德辛是何许人？”，原来这位安塞尔

姆·德辛是德国一位神学家、历史学家、本笃派教士。他于 1753 年同别人论战时，把倡导自然法的人同信奉天主教的神学家加以区分。由于倡导自然法的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德辛就称之为“社会主义者”。

从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到表达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概念涵义的一大进展。19 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在其论文《驳反社会主义》中，抨击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社会的人，所以社会主义是自然的要求，是历史的遗留，而个人主义则是反社会主义的。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对立了起来：前者以社会为本位，后者以个人为本位。

从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出发，到追求人类美好生活状态的理想，是“社会主义”概念涵义的又一大进展。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充斥社会生活中的非人道行为和形形色色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所带来的腐败、黑暗和社会混乱，使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开始设想超脱现实人世间“悲惨世界”的“乌托邦”境界。这样，一面揭露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一面张扬同现实社会截然对立的理想蓝图，就成为激进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现实斗争的不可或缺的两条战线。

但是，真正赋予“社会主义”概念近现代意义的，应归咎到英国欧文派主办的《合作》杂志。该杂志在 1827 年 11 月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资本归公有的人是“公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后，法国圣西门派主办的《环球》杂志于 1832 年 2 月刊文把“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名称。

对“社会主义”概念作了简略的追根溯源之后，就可以在理想社会主义（即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尚未创建）的大框架下来研究一下恩格斯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社会主义由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

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事实是：空想社会主义从萌芽到第一个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运用虚构的故事体裁，写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后人简称之为《乌托邦》），都要比“社会主义”概念的出现早得多。但莫尔仍被后人称为社会主义理想制度的第一位探索者。他在资本主义最早萌发期就率先揭露资本原始积累的“私有性罪恶”，并描绘了一个崭新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蓝图。尽管在他所建构的理想国度中，家庭手工业式的生产力和封建等级关系的“基础”阴影无法抹去，但关于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和平均分配、领导者是人民公仆以及民主议政的构想，却刻画出了其后来者既继承又不断充实、改进的基本轮廓。

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闵采尔的“千年太平天国”，构成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以虚幻形式表达社会主义理想的主线。

17—18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大发展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思考和构想增添了理性的光芒和法治的内容。从摩莱里的“社会主义法典”到马布利的“理性社会主义”，再到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对社会主义理想制度的思辨设想越来越厚实、具体。

19世纪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显露，使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最高阶段。无论圣西门的“实业制度”，还是傅立叶的“和谐制度”，乃至于欧文的“共产主义试验”，都更加深入地触及到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同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性，都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人类思想智慧中超越现实的对普遍利益、平等、正义的追求。

把上述所有关于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理想追求（包括某些试验）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他们还不可能发

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道路，还看不到实现理想的现实主体力量。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创立并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但他们的理论是不成熟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①

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一度被各种各样的“思想贩子”们所利用，在残酷的竞争中失败的资本家、破产了的贵族以及小资产者，都在 19 世纪 40 年代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欧洲大陆先后出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新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学说时，对这些思潮进行过无情的批判。当时，为了同这些不科学的、浅薄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特别是为了同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不把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称为“社会主义”，而是称为“共产主义”。在他们当时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②

直到 1850 年，马克思在其《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提出“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以此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随着五花八门的不科学不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潮逐渐败落，工人运动仍坚守着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把工人解放运动及其理想目标称作“社会主义”。马克思在 1874 年至 1875 年初写作《巴枯宁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一书摘要》时，开始正式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并强调指出：“‘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0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36 页。

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①而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的名著《反杜林论》中，在论及他与马克思创立的新学说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学说的关系时，称这三位思想家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称他与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1880 年，他又把《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三章汇集成单行本出版（法译本），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后，波兰文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直到 1882 年德文版本出版时最后确定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书名。与上述情况相联系的另一个不争的史实就是：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未曾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别。70 年代中期，马克思首次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分为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加以设想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其科学性的理论源头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共产党宣言》，有人认为是《资本论》，还有人认为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导言中说得很明确：“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他在该书第一章末尾又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在第二章的末尾，他又写道：“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②

这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2、416、424 页。

其一，社会主义要变为科学，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这可以说是理论的源头。同时，社会主义要变为科学，“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可以说是实践的源头。因此，这个源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源头。从现实出发本身，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历史观的根本要求——“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①。

其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作为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的两大依据和原因。关于这一点尚需加以辨析，因为它涉及到了剩余价值学说。首先，从源头的意义来看，剩余价值学说无疑是马克思新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应用的理论产物，是依据新历史观的原理来探明资本创造财富的秘密，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论》无论从哲学层面看还是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看，都是人类文化史上屈指可数的皇皇巨著。但是，从哲学的层面看，它显然属于运用哲学（有人称这为经济哲学）。“唯物论的历史观”是它的理论源头。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看，《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受历史时空域的局限，也只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行程，而不可能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机制及其运作规则作出进一步的考察。同时，它对资本主义历史变化发展的预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后来发生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只能由后人去研究、解决。鉴于这些理由，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理论源头只能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观（“唯物论的历史观”）。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矗立在新历史观（“唯物论的历史观”）这个理论基础之上的。

同时，也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观是充满生气勃勃的辩证法精神的，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德文版序言中所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

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曾经充满活力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这一历史观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中，以历史辩证法透析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实践活动，真实关注全人类命运与前途。他们设计了人类发展的理想社会，并为真正实现美好理想创设出一般的法则。可惜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历史观的本真精神在理论上曾被教条化、实用化所扭曲，在实践上曾被扭曲了的政治斗争所奴役。他们的历史观所具有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也长期没有被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扬弃上来。历史辩证法往往只是一种堂而皇之的旗帜，而真正猖獗的则是形而上学。

以实践的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以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作为实践基础，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克服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基本矛盾的深入研究，发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他们设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主要步骤：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里；第三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将来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基础。他们期望无产阶级革命能在当时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7—378 页。

家里同时发生，“共同胜利”，一次又一次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他们坚持组织与有产阶级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们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构想，社会主义被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加以界定，并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提出了天才构想。在他们的构想中，未来社会人本身的发展也会出现全新的形态：人的个性在经历了历史上以人对人的依赖为基础、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必然阶段后，会发展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个人共同掌握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新型个性，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不难看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在内容上同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

而且，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还亲自领导了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剥削阶级、被压迫民族推翻旧社会的现实运动，深入研究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条件、根本任务和具体途径、方法；亲自总结了 1848 年欧洲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总结了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亲自组建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在同社会现实和斗争实践的结合上也凸显出空想社会主义所不可能具备的本质特征。

二 理想主义的本色：飞跃—— 反差——局限

毫无疑问，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性界限，应当作为一个前提性的事实加以确认。

但是，在经历了 20 世纪一整个百年大时代的历史跨度之后，再来反观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那么仅有上述认知是不够的。应当

清醒地看到，科学社会主义与 20 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和所经历的曲折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通过实践的检验，更能折射出它的理想主义的浓厚色彩。当然，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地提出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 他们这段话的根本精神，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但他们是在说明“现实的运动”作为头等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尤其如此）时说这番话的，并不是绝对地否定任何对未来美好社会状况的设想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判断。因此，从社会主义的制度产生和制度建设的实践角度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界定为理想社会主义，丝毫没有贬损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意义的意思，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它同 20 世纪出现的实践社会主义加以对照、比较研究，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纵向过程中探讨它的准确历史定位和历史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达到的理性认识，需要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加以运用，加以检验，加以丰富，加以发展。在此之前，只能作为理性认识的理论形态而存在，只能以超前的、预设的理想形态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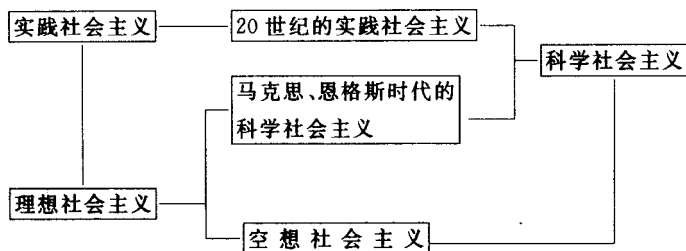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观点：

同空想社会主义相比，“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质的飞跃。同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实践社会主义）相比，“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理想社会主义。

20 世纪的实践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转化为实

践，因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时代。

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有 20 世纪实践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图式来表示：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具有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这就使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还有不完善的、不科学的成分，甚至是空想的成分。因此应当引出另一个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历史过程，在其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的科学化远没有完结、终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和完善，是经历了 20 世纪巨大成功和巨大挫折的“实践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要继续推进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在发展。只有发展才能逐渐成熟，只有发展才能逐渐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历史阶段所达到的理论高峰，都仍然是相对真理。每一代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者和理论创新者，都没有资格把自己装扮成绝对真理的终极完成者，否则只会被社会主义实践所抛弃。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社会主义，其历史局限性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 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处在发展、上升的初期阶段。从生产力方面看，一方面其生产力发展迅猛，超过以往任何社会，但实际水平仍不太高。据统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美四个国家 1866 年的生铁产量总和也只有 824 万吨。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剥削还带有原始性质。资本主义各方面的体制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处在艰难的“磨合期”。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矛盾都表现得十分激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资产阶级主要依靠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加以统治。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很自然地把目光集中在社会矛盾、冲突方面，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功能认识不足，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性估计过高。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但是，资本主义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社会生产力还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的发展又达到新的水平，生产率没有降低反而有新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出现镇压职能的弱化趋势与管理职能的强化趋势；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对抗性逐步趋缓。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资本主义是以对资源和金钱占有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也以内外政策的暴力和镇压为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前期阶段。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当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中叶受现代高科技的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56 页。

动又逐渐步入以智力和知识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后，19 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中的历史局限就更加凸显出来，其中许多思想、原理和方法由于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第二，以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黑暗面作为绝对对立的参照系来设计新社会模式图景的局限性。

借助于对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知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在对未来社会前景的构想时，把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暴露出来的消极面、黑暗面作为反面的参照物，试图“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以与此绝对对立、不可相容的思路来设计新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框架。反面的参照物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引发的社会罪恶，他们设想的则是与此相对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化；反面的参照物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及其弊端，他们设想的则是实行社会生产计划化；反面的参照物是当时的商品经济，他们设想的则是实行消灭商品和市场的产品经济；反面的参照物是按资分配，他们设想的则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反面的参照物是当时的不断强化国家镇压职能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设想的则是消灭一切阶级和消灭国家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

上述设计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的克服和批判，其一定的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但是，从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扬弃的意义来看，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层面如何正确地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其次，绝对对立、从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的思维路径，很容易自然而然地把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搬过来，作为建筑“理论大厦”的材料，从而影响自身学说的科学含量。恩格斯晚年对此有所意识。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

是一个幻想。^①当然，从人类思想史发展过程来看，初创期的科学社会主义内含某些空想的成分是不足为怪的。而逐步克服空想的东西，防止把空想的东西当作指引行动的不变教条，则是 21 世纪实践社会主义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大问题。

第三，对处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工人阶级的成熟程度和主体动力作用估计过高的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把工人阶级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政治统治的主体力量和阶级力量。工人阶级要担当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双重历史角色，任重而道远。工人阶级的主体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其代表新生产力的先进性、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彻底性以及组织性、纪律性不是天生的，只能在实践活动中经过不断地锻炼、探索、自我改造而逐步形成。而所有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却过多地从阶级本性的意义上加以肯定，而对其发展、成熟的历史长过程估计不足。在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动下，对工人阶级的成熟程度和主体动力作用估计过高，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寄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主观期望。他们所殷切期待的由工人阶级主动发起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共同胜利”的局面，生前没有出现，在他们逝世后的 20 世纪也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进入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加速下降，第二产业工业的比重逐渐缩小，而第三产业服务业则迅猛扩大。由于产业结构的变革，广大的第三产业从业者已经从数量上超过了传统的产业工人；知识劳动者在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则又从质量上对产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提出了挑战；经济发展的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一体化，又使工人阶级在劳资关系的结构

中渐趋弱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工人阶级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浪潮中反而逐渐处于下风，成了“输家”，出于维护既得的利益，其政治意识也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对社会变革表现出冷漠和消极，以致不再构成左翼政治力量的稳定基础。（例如，据法国《快报》周刊调查统计，在 1995 年法国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工人选民投给信奉社会主义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候选人的选票加起来还没有投给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候选人的选票多）与此同时，被称作知识阶级的社会集团越来越扩大。由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资本和劳动最终都要受知识的制约和支配，工人阶级知识化和“知识阶级”独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三 实践的转化 辉煌—— 失败——主体性特征

令马克思、恩格斯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 20 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制度由理想转化成了实践。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以实践的形式开始发生于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是俄国（前苏联），然后是中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

诚然，早在 1882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俄国革命时也曾承认，俄国不一定非要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但是，对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有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俄国革命必须先由西方的

即欧洲与北美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持和引导。在他们看来，“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选，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①。然而，正是这个俄国在 1917 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首先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大一统体系，在占世界 1/6 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由理想到实践的飞跃，理论学说变成了现实制度，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天才领袖列宁想不到的事情则发生在 20 世纪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与此相连的还有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实践社会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信任危机。20 世纪兴盛过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走向了毁灭，但社会主义仍在顽强地生存着、发展着。实践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似乎并没有因巨大挫折而丧失，反而在改革的过程中磨炼得更加坚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总结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最紧迫、最重大的时代课题。

把 20 世纪兴盛过、辉煌过、失误过、失败过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称之为实践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为了对应于理想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对应本身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为了从主体实践的意义上认识它，研究它。

20 世纪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兴亡、是非功过，要实事求是地具体研究。这无疑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程”。但若从主体实践的意义来认识和研究，似乎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1. 理想向实践飞跃的试验性

20 世纪实践社会主义从人类发展史中社会形态的跃迁来看，也可以称之为实验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上，这场伟大而艰难的试验利用了极有利的客观条件，找到了薄弱环节上的突破口，把握准了变革的时机，以主体自觉主动的选择、创造，产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19 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试验没有成功，而 20 世纪实践社会主义的试验则取得过辉煌的成功。但是，正因为是试验，实践中遇到各种矛盾、困难、阻力，以及历史传统的沉重包袱，特别是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宏观决策层出现问题，就难免招致失误、曲折，不仅走了许多弯路，而且发生了重大失败。回过头来看，实践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的成功、失误乃至失败，都是试验中的成功、失误与失败。放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历史长过程中来看，这是初期发展所必然带有的特点。这种试验性、尝试性、探索性，将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经历很长的时期。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试验性是其本身应有的特征。经历了 20 世纪末的严重挫折和失败之后，实践社会主义的试验性还会在改革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

为什么同样是试验，却有成功与失败的巨大反差。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看，主要有一个如何把坚持实事求是与发挥主体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的根本性问题。

在中国经历巨大历史挫折而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了“大胆地进行试验”——“不断地总结经验”——“科学地进行检验”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试验观，为实践社会主义的试验探索指出了方向。这里不妨略作阐述：

(1) 大胆地进行试验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

也是一种试验。“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他认为，试验的主体“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验，要求主体具备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①。

大胆地试验，要求主体保持高度的自觉性，不能盲目地试，胡乱地试，即“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试和闯的过程中要头脑清醒。例如，关于多搞一点“三资”企业，“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②。

大胆地试验，必须处理好“允许看”与“不争论”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在认识过程中，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允许有人怀疑，允许有人看。“既然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即使在主张和提倡的人当中，保留一点怀疑态度也有好处。”“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另一方面，在宏观决策上，“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要“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③可见，“不争论”并不简单、绝对排斥“允许看”，而“允许看”则要服从于大胆试，有利于大胆试。

大胆地试验，还要求主体经得起冒风险、犯错误的考验。邓小平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我们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35、174、372页。

② 同上书，第373页。

③ 同上书，第374页。